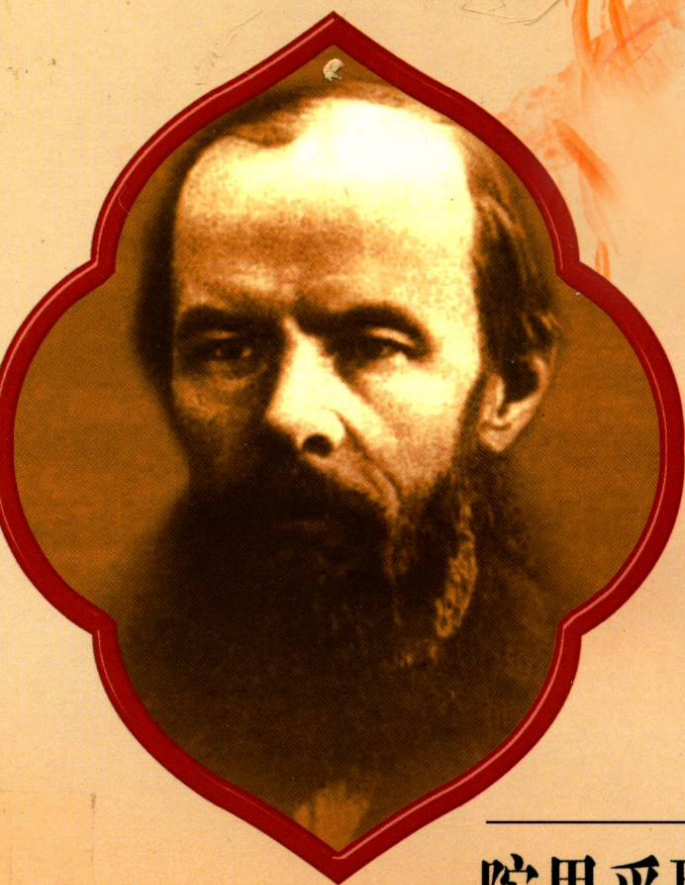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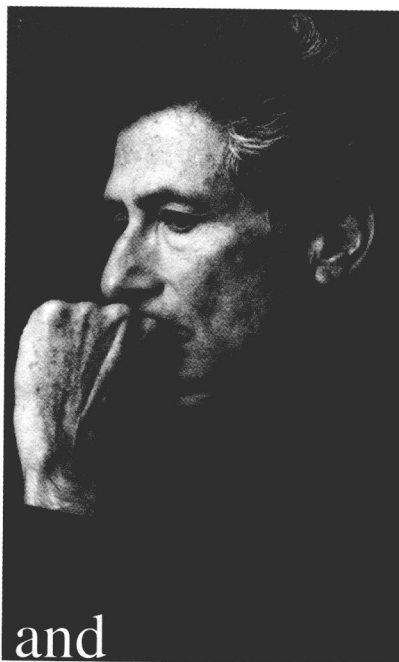
世界巨人传记丛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

【 文学 家 卷 】

海天出版社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李琨 译

文化与帝国主义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帝国主义 / (美) 萨义德著; 李琨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0 (2004. 3 重印)
(2007. 6 重印)

ISBN 978 - 7 - 108 - 01954 - 7

I. 文... II. ①萨...②李... III. 文化哲学 IV.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7679 号

特约编辑 宋念申 赵燕灵

责任编辑 舒 炜 冯金红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 - 1998 - 2917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75

字 数 368 千字

印 数 10,001 - 20,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献给 Eqbal Ahmad

对世界的征服，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就不觉得是什么光彩的事了。它首先意味着从那些与我们肤色不同，或鼻子稍扁的人手中夺取土地。只有观念能作为托词，一种居于其后的观念；不是什么感情上的表现，而是一种观念；以及对这种观念的无私的信念——你可以把它供奉起来，向它膜拜，为它牺牲……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

前 言

在 1978 年出版了《东方学》(*Orientalism*) 大约五年之后,我开始把写这本书时所形成的一些关于文化和帝国之间关系的观点搜集在一起。最初的结果是我在 1985 和 1986 年间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一些大学所开的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形成了目前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写这本书。在《东方学》中,我汲取了大量的人类学、历史学和区域研究的成果,但那本书涉及的仅仅限于中东地区。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扩充《东方学》的观点,对现代西方宗主国与它在海外的领地的关系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描述。

这本书引用的源于非中东的一些资料指的是什么呢?我指的是欧洲人关于非洲、印度、远东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加勒比地区的著作。我把这些被称为非洲学家和印度学家的著作,在我看来是欧洲对遥远地域和民族统治企图的一部分,因此,就与东方学学者对伊斯兰世界的描述和欧洲人对加勒比岛国、对爱尔兰和对远东的描述有着联系。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著作在描写“神秘的东方”时,总是出现那些刻板的形象,如有关“非洲人(或者印度人、爱尔兰人、牙买加人、中国人)”的心态的陈词滥调,那些把文明带给原始的或野蛮的民族的设计,那些令人不安的、熟悉的、有关鞭挞和死刑

xii 或其他必要的惩罚的设想,当“他们”行为不轨或造反时,就可以加以惩罚,因为“他们”只懂得强权和暴力。“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因此就只能被统治。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非欧洲地区,白人的到来总是伴随着某种方式的反抗。我在《东方学》中没有谈到的,就是以遍布第三世界的声势浩大的非殖民化运动为顶峰的对西方控制的反应。与19世纪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爱尔兰、印度尼西亚这样不同地区的武装斗争遥相呼应的,还有各地的文化抵抗运动和对民族属性的诉求。在政治层面,涌现了各种组织和政党,以自治和民族独立为共同的目标。没有一处,西方入侵者所遇到的是麻木不仁的非西方的当地人,相反,他们总是遭遇到某种形式的反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以反抗一方的胜利而告终。

这两种因素——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使得本书不仅仅是《东方学》的续篇。在这两本书中,我都比较笼统地强调了我所谓的“文化”的提法。我所谓的文化,有两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等等活动。这些活动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它们通常以美学的形式而存在,主要目的之一是娱乐。当然,其中既有关于遥远的世界的传说,也有人种学、历史编纂学、哲学、社会学和文学史等等深奥学科的知识。因为我在这里关注的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西方帝国主义问题,我特别讨论的是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我认为,小说对于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我并不是说小说是惟一重要的。但我认为,小说与英国和法国的扩张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

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型是《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

最近出现的大量批评都集中在叙事体虚构作品上。然而，这些批评并没有注意到叙事体虚构作品在历史和帝国世界中的作用。本书的读者将会很快地注意到叙事在我的论点中的重要位置。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了二者之间主要的纽带之一。最重要的是，关于解放和启蒙的叙述动员了人民奋起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受到了这些故事及其宣传者的激励，他们也在为建立关于人类社会的平等的新的叙事而斗争。

第二，如马修·阿诺德（Arnold, Matthew）在 19 世纪 60 年代所说，文化这个概念很微妙地包含了一种使人美好、高尚的东西，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素。阿诺德认为，文化如果不能使一种现代的、具有侵害性、商业性和野蛮的城市生存状态消失的话，至少也能使之减弱。一个人阅读莎士比亚和但丁，是为了获取人类优秀的遗产，也为了了解

自己、同胞、社会和传统中最美好的东西。在某一个时候,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文化这时就成为身份的来源,而且火药味十足,正如我们在最近的文化和传统的“回归”中所看到的。与那种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杂交的自由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容忍态度相反,这种“回归”伴随着一种知识与道德上的强烈规范。在一些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里,这种“回归”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

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例如美国、法国或印度的学生,在阅读其他经典著作之前要先阅读他们本民族的经典著作,因为人们期望他们能够在欣赏并不加批判地忠实于本民族与传统的同时,贬低其他的民族与传统,并与之斗争。

关于文化的这种观念现在的问题是,它不仅要你尊重自己的文化,而且要用一种脱离日常世界的超越性方式来思考之。因此,大部分专业人文学者都不能把长期的、残酷的奴隶制度、殖民主义、种族压迫和帝国主义统治与为这些活动服务的诗歌、小说和哲学联系起来。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发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政府官员在统治印度或阿尔及利亚时理所当然地实行的“从属”、“低劣”等理念,在我所尊敬的英国和法国艺术家中,却很少有人提到。这些观点广为人们所接受,并在整个 19 世纪帮助帝国主义在非洲夺得

领地。我认为,批评家们在谈到卡莱尔(Carlyle, Thomas)、拉斯金(Ruskin, John)、甚至狄更斯(Dickens, Charles)和萨克雷(Thackeray, William)时,把他们关于殖民扩张、低等种族或“黑鬼”等等的观念归到与文化很不相同的一个门类里去了。在他们看来,文化是一个他们“真正”从属、并在其中做着“真正”重要工作的领域。

这样构想出来的文化能够成为一块保护地:进来之前要先检查一下你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一生都以教授文学为职业、而又生长在二战前的殖民世界的人,我发现我很难以这样的方式来看文化——即,免疫于它的尘世关联。反之,我将它看成是集中了多种多样的人为的努力的场所。我之所以分析这些小说和其他作品,首先是由于,我认为它们是值得尊重的艺术和学术作品。我与其他读者能从中获得乐趣和教益。其次,困难在于不仅仅把它们与乐趣和教益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们看作殖民进程的一个明显的组成部分,而不要忽略它们所在其中的社会的现实。我认为我们对这个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方面的了解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它们的阅读和理解。

让我借助两部著名的优秀小说来简单说明我的观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1861)(*Great Expectations*)是一部关于自我幻想的小说。匹普想成为一名绅士,可他既不想努力奋斗,又缺乏成为绅士所必备的贵族经济来源。年幼时,他曾经帮助过一个被判了刑的囚犯。这人名叫阿贝尔·马格维奇。马格维奇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之后,馈赠了他年轻的恩人一大笔钱作为回报。由于负责此事的律师把这笔钱交给匹普的时候,并没有说明真相,匹普认为这钱来自一个老妇

人哈维山小姐。后来，马格维奇非法潜回伦敦，却遭到了匹普的冷眼，因为马格维奇浑身上下都透着犯罪的气息而令人不快。然而，最终，匹普还是向马格维奇和现实妥协了：他终于接受了正在被警方追捕、狼狈不堪而且已经病入膏肓的马格维奇，认他为义父，而不是什么可以被拒绝或摒弃的人。尽管马格维奇事实上是无法被接受的。因为他来自澳大利亚那个专门改造犯人的地方。那里的犯人是不能被遣返回国的。

xvi 大多数读者，如果不是全部，都将这部卓越的作品置放于英国小说中反映的宗主国历史背景里。我却认为它属于比上述解释范围更广、更生动有力的历史。在狄更斯的这本小说以后，又有两本近作——罗伯特·修斯（Hughes, Robert）的权威之作《致命的岸》（*The Fatal Shore: The Epic of Australia's Founding*, New York: Knopf, 1987）和保罗·卡特（Carter, Paul）优秀的推理小说《通向植物园湾的路》（*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88）——展示了关于澳大利亚（一个如爱尔兰那样的白人殖民地）的历史的推想。我们在其中看到的马格维奇和狄更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通过小说，通过更长期、更广阔得多的参与来体现的。

18 世纪末，澳大利亚被建成罪犯流放地，使得英国能够把众多的、多余的、不可赎身的重犯运送到这个库克船长发现的地方，同时也用它来代替英国在美洲丧失的殖民地。追求利益、建立帝国和修斯所说的“社会隔离”，共同造就了现代的澳大利亚。到狄更斯对它发生兴趣的 18 世纪 40 年代，（在《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威尔金斯·麦

考伯很高兴地移民到那里。)澳大利亚已经多少进步到人们可以受益的程度,并出现了一种“自由制度”。劳工如果获准,可以自食其力,而且生活得不错。然而在马格维奇这个人物身上,

狄更斯在英国人关于这些罪犯在澳大利亚的定居的推想上做了一些编排。他们可以成功,但是他们很难在真正的意义上回归。他们可以在技术和法律的意义上去赎罪,但他们在那里遭受的一切将他们扭曲成永久的外人。当然,他们可以赎身,只要他们留在澳大利亚。¹

卡特对于他所说的澳大利亚空间史的探索,使我们获得了相同故事的另一版本。在这片土地上,探险家、罪犯、人种学家、投机者和士兵都在各自绘制着这块广袤的、相对空旷的大陆。它们互相冲突、替代或补充。《通向植物园湾的路》首先是对旅行和探险的启蒙式描述,然后又有了旅行者(包括库克船长)的叙述。他们的话语、地图和意向汇成了新的领土,并逐渐地把它们变成了“家园”。在卡特笔下,边沁式的空间组织(墨尔本市就是按照这一模式设计的)与澳洲灌木的明显无序紧密相接,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令人振奋的变革,并在1840年代形成了绅士们的乐土和劳工的伊甸园。²狄更斯为匹普所展望的,就是成为马格维奇那样的“伦敦绅士”,与英国施主给澳大利亚的展望相类似,一种社会空间控制了另一种。

xvii

但是《远大前程》中并没有修斯或卡特的书中所有的那种对土著澳大利亚人的关注。它也没有带来或预示关于澳

大利亚的写作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反映在后来的包括如大卫·马洛夫(Malouf, David)、彼得·卡利(Carey, Peter)和帕特利克·怀特(White, Patrick)的文学作品中。马格维奇之不被允许回国,不仅仅是惩罚,而且是帝国主义式的:臣民可以被送到澳大利亚那样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能回到宗主国空间来。就像狄更斯所有的小说中所证实的那样,那里已被宗主国的上层阶级所精心划定,归为己有并占据了。因此,一方面,修斯和卡特这样的解释使19世纪英国作品中对澳大利亚薄弱的描述得到了扩大,使澳大利亚20世纪的、已经独立于英国的历史得到了充分和完整的表现;另一方面,对《远大前程》的准确的阅读能够发现,当马格维奇赎买了自己的罪过以后,或者说,当匹普悔改并承认了他欠那年老的、经过苦难而后生、并怀有报复心理的罪犯的债以后,他自己却垮掉了,然后又以两种积极的方式得到了复苏。一个新的匹普诞生了。新的匹普不再像老匹普那样为过去所累——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年,同样叫作匹普。老匹普和他的童年朋友赫伯特·波克特一起干起了新的行当,这一次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绅士,而是做了一个在东方努力经商的商人。英国在那里的殖民地提供了一种澳大利亚无法提供的正常的环境。

这样,尽管狄更斯解决了澳大利亚的困惑,一个新的观念的结构和指涉又出现了。这就是大英帝国通过贸易和旅行与东方的交流。狄更斯笔下几乎所有的商人、任性妄为的亲戚和令人生畏的外来人,都与帝国有着一种相当正常的、稳定的联系。作为英国殖民商人,匹普也不例外。但是只是在近些年来,这些联系才具有了可以说明问题的重要性。新

一代的学者和批评家——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非殖民化之子，是本国自由进步的受益者（在性别、宗教和民族方面的弱势者）——在西方文学的巨著中看到了一种对所谓次等世界的持续的兴趣，这些地方充斥了次等有色人种，随时可以让许多鲁宾逊·克鲁索来干涉。

到 19 世纪末，帝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影子了，也不再化身为一个不受欢迎的罪犯的形象，而是体现在康拉德（Conrad, Joseph）、吉卜林（Kipling, Rudyard）、纪德（Gide, André）和洛蒂（Loti, Pierre）等人作品的关注中心里。我的第二个例子，康拉德的《诺斯特洛莫》（*Norstromo: A Tale of the Seaboard*, 1904, rpt. Garden City: Double Day, Page, 1925）是以中美洲的一个共和国为背景的。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同于他以前一些小说中的非洲和东亚殖民地），但同时又因为大量的银矿而被外来利益集团所控制。对于一个当代美洲人来说，该作品最令人叹服的地方是康拉德的预见力：他预言拉丁美洲共和国内部将发生不可遏制的动乱和失控（他引用波利瓦尔的话说，统治他们就像破浪而行）。他特别指出北美的那种特殊的施加影响的方式：既果断又不留痕迹。圣多美矿矿主，英国人查尔斯·古得尔的后台，旧金山的金融家霍尔洛德告诫他的被保护人说，作为投资者，“我们不会卷入大麻烦”。但是，

我们可以作壁上观。当然，有朝一日，我们会介入。我们必须这样做。但不忙。时间会青睐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我们将会在所有的事上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霍恩角到苏利斯

海湾,甚至超过那里,如果北极有什么值得得到的东西的话。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岛屿和大陆统统弄到手。我们要管理这世界的事情,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世界对此无可奈何,我想,我们也是如此。³

xix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关于“世界新秩序”的修辞,它那一种孤芳自赏的气味、难以掩饰的胜利情绪和它对责任的庄严承诺,都是康拉德在霍尔洛德身上描写过的:我们是老大,我们注定要领导别人,我们代表着自由和秩序,等等。没有美国人能逃脱这种感觉体系。但康拉德在对霍尔洛德与古德尔的描绘中所包含的警告却很少受到注意。因为在帝国的背景下,话语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仁慈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话语具有一种该死的特点:它曾不只一次被使用过。不但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使用过,还以惊人的频率多次被现代的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俄国人使用过。现在,又轮到了美国人。

然而,仅仅把康拉德的这部伟大作品看作对 20 世纪的拉丁美洲的预言:包括那些联合果品公司、上校们、解放力量和美国资助的雇佣军等等现象,就太不完整了。康拉德是西方对第三世界认识的先见者。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认识可以从格雷厄姆·格林(Greene, Graham)、V. S. 奈保尔(Naipaul, V. S.)和罗伯特·斯通(Stone, Robert)等不同的小说家、汉娜·阿伦特(Arendt, Hannah)这样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以及那些旅行作家、电影制作者和演说家的作品中看到。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刻画一个非欧洲的世界,以供分析和判断,或满足那些欧洲和北美的观众读者的特殊胃口。假如康拉德真

的具有讽刺意味地认为,圣多美矿的英美矿主的帝国主义行径因为他们自己的狂妄和不可达到的野心而注定要失败的话,那么,他同时也是在以西方人的视角描写非西方世界。这样的视角根深蒂固,他看不到除此之外的历史、文化和观念——康拉德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完全由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所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对西方的反抗都只能更证明西方的残忍的力量。康拉德无法看到替换这一残酷力量的东西。他无法了解印度、非洲和南美洲也有不完全受帝国主义者和改革者控制的完整的生活和文化;他也无法让自己相信,反帝独立运动并非都是腐败的,都是由伦敦或华盛顿出钱操纵的。 XX

这些观念上的严重限制与人物和情节一样,是《诺斯特洛莫》的组成部分。康拉德的小说体现了他所讽刺的人物,如古尔德和霍尔洛德身上的那种帝国主义家长式的无知。康拉德好像在说:“我们西方人将判定谁是好土著,谁是坏的,因为土著只有经过我们的承认才存在。我们创造了他们,我们教给他们说话和思想。他们造反的时候,只能更证实我们的观点,认为他们只是被他们的一些西方主人欺骗了的愚蠢的孩子。”这正是美国人对他们的一些南方邻国的观念:独立可以,但必须是我们所认同的那种独立。任何其他都是不能接受的、很糟糕的和不值得考虑的。

因此,康拉德既是反帝国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这并不矛盾。当他无所畏惧又悲观地揭露那种自我肯定和自我欺瞒的海外统治的腐朽时,他是进步的;而当他承认,非洲或南美洲本来可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历史和文化被帝国主义者粗暴践踏,但最终他们被自身历史和文化所打败

时,他是极为反动的。然而,为了避免将康拉德简单地看作他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我们最好注意到,当前华盛顿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决策者以及知识分子并没有比他进步多少。对于康拉德所发现的帝国主义式的仁慈——包括“使世界更加民主”等愿望的必然失败的命运,美国政府仍然认识不到。它还在将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全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康拉德至少还能有勇气认识到,这样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它把策划者引入更深的、自认为无所不能和自我满足(像在越南那样)的幻觉之中。这种企图的失败,还由于他们出于本性要伪造证据。

如果在阅读《诺斯特洛莫》时人们注意到它的巨大力量和内在局限的话,所有以上这些就都值得记住。在这本书的结尾出现了一个新独立的国家苏拉科。它只是大国的一个受到更严密控制的、不能容忍他人的小型版本,但是它在财富和重要性上取代了大国。康拉德使读者看到,帝国主义是一种制度,被统治者的生活打着统治者的虚假和愚蠢的烙印。反之亦然,当这种统治被当作传播文明的使命时,统治者社会的经验已经无可选择地依赖于殖民地和当地人。

不论从什么角度阅读《诺斯特洛莫》,它都提出了一种冷酷无情的观点,而且它都确实实地导致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沉默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s*)或 V. S. 奈保尔的《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中同样严重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幻觉。这两本小说的主题与《诺斯特洛莫》完全不同。在越南、伊朗、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古巴、尼加拉瓜和伊拉克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几乎所有的读者都相信,正是格林小说中的派尔或奈保尔书中的休斯曼神父等人的严重无